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年回望与反思

王子舟

摘要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走过了九十年历程,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0—1949 年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及第一个繁荣期;1950—1977 年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二次繁荣并跌落的阶段;1978—2008 年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三个繁荣期及其走低与再兴。在对早期图书馆学学科形成过程以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与分析了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认为未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理性发展应将专业注意力转移到“知识”上来;对以往丰富的办学层次重新进行定位;继承前贤“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思想,使专业教育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参考文献 14。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教育 教育发展史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as already gone through nine decades.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1920 to 1949 was the beginning and the first prosperity stage; 1950 to 1977 was the second prosperity and decline stage; 1978 to 2008 was the third prosperity, decline and revival stag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and features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fully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e futur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knowledge”, redefine its various levels, and inherit the predecessors’ idea of constructing China’s own library science, so that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an have Chinese features. 14 refs.

KEY WORDS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Educational history.

CLASS NUMBER G250

图书馆学教育是图书馆职业稳定发展的支撑,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有着近九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有起有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约三十年左右,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为迎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九十周年的到来,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1 图书馆学的形成及早期专业特点

1.1 图书馆学科的形成

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实践中逐步产生的一门科学。古代图书馆工作以图书整理为主,长期的图书整理实践使之慢慢提炼出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如我国古代有关图书的版本、校勘、注释、分类、目录、辑佚、辨伪、编纂等学问,它们被晚清学者及近代学者笼统称为校讎学或目录学。

西方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也是建立在图书整理基础上的,也形成了有关图书的版本、校注、收藏、分类、目录、辑佚、手稿鉴别、编纂等方面的学问,被西方学者称为图书学(Bibliology)与书志学(Bibliography,亦称为目录学)。

而真正将图书馆知识体系视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应从 1807 年开始。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格(M. W. Schrettinger, 1772 – 1851)在这一年使用了“图书馆学”(Bibliothek wissenschaft)这个名称(德语中 wissenschaft 是被当作一个表示系统知识的一般术语来使用的)。他后来出版的两卷本《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更是系统地阐述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与基本特征。1886 年,世界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培训机构——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由齐亚茨科(K. Dziatzko, 1842 – 1903)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开办,讲授的课程有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

学、图书馆经营法等科目。目录学、抄本史、印刷史、古文书学是研究图书的传统知识体系,只有图书馆经营法是新图书馆的发展催生出来的新内容。可以看出,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讲授的图书馆学,基本上还是以图书整理为研究轴心的,它是以培养有能力辅助科学研究的图书馆馆员为目标的。如古文书学(Palaeography)的主要内容就是解释古代公文、书翰、敕令、特许状、遗嘱等内涵,判定其年代、真伪等^[1]。1887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开办“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校”的办学目的也是培养专业的图书馆职业人才,因此该校所开设课程多以实用技术为主(包括图书馆经营、目录学、专题讲演、业务指导、学术讲演等)。

齐亚茨科与杜威的办学改变了以往知识与技能“师徒相传”的方式,把图书馆学变成一种职业教育。至此,图书馆学不仅以一门独立的科学姿态面世,而且开始为推动图书馆职业化而进行了有意识的专业建制活动。图书馆学学科意识与专业建制的出现,至少向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图书馆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具有专门图书馆学知识的人才能充任此职。正如杜威在188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引述英国图书馆学家特德(Tedder)的话说:“图书馆员宣称其职业为一专业的时代业已来临!”^[2]

1.2 图书馆学专业的早期特点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主要以经验性、操作性知识为主,知识深度与理论含量都明显欠缺。1918年,以巨款赞助图书馆事业的卡内基金会委托图书馆学专家威廉森(Charles C. Williamson, 1877-1965)调查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三年以后,威廉森提交并公布了名噪一时的调查报告《图书馆服务之训练》(1923年)。这份报告批评了当时以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教学目的的图书馆学校的通行做法,指出图书馆学校应致力于专业性训练而非事务性训练,专业性训练应在四年大学教育基础上进行,而且大学一年级的专业研究应属一般性及基本性的,二年级开始专门化的课程研究^[2]。此后,图书馆学

普遍进入了美国大学课程之中,成为一门新兴专业并得到快速发展。

从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以及图书馆学专业建立的历史来看,早期图书馆学表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1) 图书馆学属于一门经验科学。经验学科不是以假设、公理、逻辑为基础的,而是以实践、实用为基础的,因此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如技术进步)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经验学科的发展更多地借助人的隐性知识,其学术价值更多的不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而是以实用工具(如各种书目、工具书)形式体现的;经验学科通常不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回答“怎样做”的问题。韦伯说:“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3]按韦伯的意思,“应当”的问题只能由人文学科来解决,图书馆学解决的只是“能够”和“想要”的方法与路径上的问题,所以它自身具有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

(2) 图书馆学的职业支撑功能很强。德国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讲座与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校早期的职业培训,使得图书馆学专业在形成之初就具备了很强的职业支撑功能。虽然图书馆学后来成为大学一门新兴专业,但这个功能也没有遭到削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不受益于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存在。尤其是当图书馆职业在收入、权力、声望还没有获得高收益名签的时候,那些能留在图书馆并以其为献身事业、终身志业的工作者们,他们大多数有着大学图书馆专业的学习经历。而当代许多杰出的图书馆学大家、著名的图书馆事业活动家往往也来自他们中间。

早期图书馆学的特点,突显出图书馆学专业注重实用性、职业性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这两种倾向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为专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潜在的消极影响。

其一,经验之学使得图书馆学的实用性、工具性色彩极为浓厚,但也因匮乏原理知识、理论

体系而容易致使自身沦为某种职业技术。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的兴起,标志着强调图书馆学研究科学化、从各种社会科学中获取学术资源、注重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图书馆学开始出现。理论图书馆学的内容日后逐步形成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也逐步形成了“理论”与“应用”两大板块。图书馆学原理知识、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促进了图书馆学专业地位的提升以及职业视野的开阔,但这两个板块也经常出现相互之间关系的紧张。当理论过于盛行或与图书馆实际工作相关度不高,理论研究就会遭致主要来源于实践层面的“理论无用”、“理论脱离实践”的批评;反之,理论研究也会指责实践层面过于实用主义而使自己变为浅薄的操作技术。

其二,图书馆学专业职业支撑功能固然有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是许多人忽略了一点,这就是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 - 1977)在 1936 年曾指出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纯粹追求真理的地方,其次才是一个为今后职业做素养储备的地方。尽管这两者之间时有冲突。由于社会各行各业希望大学为它们提供合格的、现成的“人才产品”,后来大学专业院系的设置重心也不得不受此需求驱动。众多专业过于关注毕业生能否在未来职场中顺利找到职业位置,其结果不仅贬低了大学,也没有提高专业的地位。纯粹追求真理与知识的目标在大学里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4]。图书馆学专业也没有脱离其影响,它对职业的兴趣远远高于学科理智的兴趣。其实,一个真正的专业学科,必须要有理智方面的内容,不仅强调专业训练,而且更加强调专业理解。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不仅教授学生“怎样做”,还应该教授学生“为什么这样做”,让学生们从专业积累下来的理智遗产中,学会对专业论题的反思与论证能力。

2 图书馆学教育的开端及第一个繁荣期(1920—1949 年)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在中国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西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

传入,即新式公共图书馆的纷纷建立急需图书馆学知识的指导;二是西方图书馆学知识在中国学术界的迅速传播,即一些美国图书馆学者、归国留学生在国内宣传先进的图书馆学知识。中国图书馆学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其主要标志有三个:① 1920 年 3 月韦棣华女士与其学生沈祖荣等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在武汉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以下称“文华图专”),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② 1921 年前后,胡庆生、戴志骞、徐燮元、杜定友、洪有丰等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留学生毕业后纷纷回国,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兴起图书馆学宣传、研究活动;③ 1923 年杨昭愬的《图书馆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正式出版,该书内容虽多取日、美两国成法糅合贯通而成,但已尝试用科学方法说明图书馆学原理及应用,开中国图书馆学通论之先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国专门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专”的成立,既有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起步的标志意义,也具有现代图书馆学在中国确立的标志意义。

文华图专成立初期,经费主要依靠自筹,教员也以外籍为主,课程体系主要仿自美国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1928 年后,才逐步建立起中西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形成了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如文华图专达到或超过 40 学时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目录学、中文参考书举要、西文参考书举要、中文书籍选读、西文书籍选读、西文书籍编目学(实习在内)、中文书籍编目学、西文书籍分类法、中文书籍分类法、现代史料、图书馆经济学、西文打字法、各种字体书写法、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实习等^[5]。此外,学校还设“特别演讲”课(1933 年改为百科性的“群育讨论会”),专门邀请各科著名学者、教授为学生演讲学科的进展、提供推荐书目、开拓学生视野、引导学生阅读。文华图专注重教学实习,以自建的开架借阅和基本免费看书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为实习场所,办馆与办学融为一体,学生的动手能力

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当时国内尚无达到一定水准的公共图书馆,因此这种办学路径有利于培养专门的图书馆人才,有利于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第一个繁荣期,除美国人韦棣华和沈祖荣创办文华图专之外,国内其他一些高校也积极创办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专业。1913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乃文(Harry Clemens)在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这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之始。1921年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增设图书管理科(杜定友为主任);1925年上海的国民大学创设了图书馆学系(杜定友为主任,1926年停办);1926年成都的四川图书馆专科学校成立(穆耀枢主事,不久也停办);1927年南京金陵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系(李小缘为主任,以后停停办)等^[6]。

此外,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短期培训也纷纷出现。1920年8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应各省之请,开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各地参加者78人,首开中国图书馆学业业余教育之先例;1922年,杜定友在广州开办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三周时间培训52名学员;1923年夏,南京东南大学举办暑期学校图书馆讲习班,第一期听课者达80人之多(以后又连续三年开班);1924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也开办了图书馆讲习会;河南开封小学校教员讲习会设立了图书馆管理课程;1926年华东基督教大学在苏州东吴大学举办的暑期学校,专设有图书馆学科;1927年湖北教育厅在汉口举办了首届图书馆学讲习所;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班等。这些短期图书馆学专业培训,为解决图书馆专门人才之需、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作出了贡献。

进入20世纪30—40年代,国内的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一个动荡发展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国内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办学机构减少,条件也越来越恶化。但少数办学机构还是努力坚持了下来。如1938年文华图专为避日寇迁校重庆,1941年夏遭日军飞机轰炸,校舍片瓦无存,但师生坚持上课,共克时艰。此时期坚持办学的还有:1930年江苏省立教育

院民众教育系成立的图书馆组(供学生三年级分组时选择学习)、1941年在四川璧山开设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学业四年,三年级开始学专业课)、1947年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附设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是王重民向北大校长胡适建议并核准后,专门由美国国创办的,1947年9月开始招生(当时只招收北大中文系、历史系成绩在75分以上的毕业生)。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图书馆学专修科从中文系分离出来独立,王重民先生任主任。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经受着国内动乱的考验,很多学校都只有短暂的图书馆学办学经历,有些学校甚至还没有招收到学生或学生还没毕业就被迫关闭。在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却培养出了一大批献身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人才。以文华图专为例,截至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之前,有专家估计文华图专在解放前后的33年中培养了专科、讲习班等各类毕业生约有380人到400人左右^[7]。他们其中不乏著名图书馆学家,如汪长炳(南京图书馆馆长)、李芳馥(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家杰(中科院图书馆副馆长)、桂质柏(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及后来去台湾的蓝乾章、沈宝环(沈祖荣之子)、严文郁等。还有一些毕业生在国外图书馆就职,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创始人和馆长裘开明(1921年毕业,后发明燕京图书馆汉和分类法)、房兆楹(1930年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童世纲(1933年毕业,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及美国亚洲研究委员会东亚图书馆分会主席)等,他们在海外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此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基本是美国的翻版,即在专业内容设置上主要以图书馆实用技术为主,重视图书馆实习,在学生培养方式上强调学中做、做中学。这样的专业教育范式,优点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图书馆实际工作可以“无缝链接”,学以致用的成本低、效率高;缺点是培养出

来的学生人文素养、科学基础比较薄弱,他们能胜任一般的图书馆业务工作需要,然而,对于一些学术图书馆来说,某些专深的知识信息工作甚至相应的学术研究却难以承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战前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缺乏馆员时,不断有人向研究所负责人傅斯年推荐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结果都被他婉拒了^①。

此外,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中国化”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还是仅仅在课程安排上增加了中文书籍的编目、分类、参考,以及传统目录学的一些内容。在图书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材编写、学术研究等诸方面,还鲜有系统地、有机地、深入地探索与建树。早在1921年,杜定友先生于菲律宾大学撰写图书馆学学士论文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 时就已经提到:“没有一所外国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善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馆用的。”^[8] 1925年6月2日,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专门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命题。他说学问无国界,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的书籍、读者有自己的历史与特点,文化、国情与欧美不同,因此发展图书馆学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9]。这些早期受欧风美雨沐浴的中国图书馆学者的自觉意识,就像一粒粒珍贵的种子,如果有充分滋养的环境与条件,这些理性的种子日后就会顺利发芽、开花和结果。可是,日本侵华战争就象一场自然灾害,延缓了它们的生长,而后来三十年中的政治风暴,又把这种可能性给堵死了。

3 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二个繁荣期及其跌落(1950—1977年)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纷扰,到1949年新

中国成立之时,全国仅有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这两个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机构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风潮,这两个图书馆学专业机构有所调整并升格。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成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4年与195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1956年,两所学校学制又从三年制改为四年制,并成立了图书馆学系。1964年北京图书馆学系开始招收研究生。20世纪50年代其它国内高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的还很少,1951年西南师范学院设立了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修科(1954年停办),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科技情报学系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东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也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但是这些专业大多没多久就停办了。

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积压图书数量也很大,各馆急需专业人才。因此,除了北大、武大两所大学的正规本科教育之外,各种图书馆学的成人继续教育与短期培训也掀起了一个浪潮。1951年和1954年文化部分别在沈阳和北京开办了图书馆学的短期培训班;1956年北大、武大分别开办了函授图书馆学专修科教育,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开办了图书馆干部训练班;1957年文化部等6个单位在南京联合举办全国省市图书馆人员进修班,同年教育部也在北京举办了高等学校图书馆员进修班;1958年北京市成立图书馆干部进修学校,文化部也成立了文化学院图书馆学研究班。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国内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但遗憾的是,这个高潮也展示出了一些发展中的扭曲,即专业教育政治挂帅、意识形态干涉

① 见:那廉君.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J].传记文学,1969(民国五十八年)14(6):56-59.又,傅斯年用人相当苛刻。文物专家王世襄回忆说,1943年冬他想去李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承蒙梁思成先生引见傅斯年。傅斯年问了一句话:“你是哪里毕业的?”王回答:“燕京大学。”傅斯年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王只好告退。因为燕京大学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傅对燕京大学毕业生文史功底不深的信念根深蒂固。见:王世襄.锦灰三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31.

学术,使得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误入歧途。许多教材不仅充斥了伪科学的内容(如强调阶级性),而且不乏因政治需要而速成者(如“大跃进”中《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仅两个月就编写出来)。专业内容要“厚今薄古”,专业教育讲“互教互学”,专业培养倡“又红又专”,完全脱离了研究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这样一个病态的发展趋势没过多久还被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给打断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停课,教师受到批判,图书、设备遭到损失。1969年,专业教师被下放农村劳动,图书馆学系陷入彻底停顿状态。1972年,两个学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恢复办学,仅招收两年制的工农兵学员,到1976年有5批学员顺利毕业。图书馆学专业的正常招生与教学,直到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才得以重新开始。

从1949年到1978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个图书馆学系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约2000人,其他如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修科、北京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中国科技大学情报科学系图书馆学专修班等,也有毕业生200余人,全国各校举办的函授班中,毕业和肄业的图书馆在职人员约1250人,三项总计约3500余人^[10]。这些毕业生充实了图书馆职业队伍,他们中的多数还成长为国内省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研究图书馆的馆长,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整体过程来看,此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规模不大,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的干涉,专业教育导向出现了偏差,尤其是社会动荡致使办学突然“断裂”,致使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失去了应有的连续性。专业教育突然“断裂”所带来的后果,不仅在当时产生影响,而且对后来的历史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首先,改革开放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重新振兴,必须先恢复到原点,而不是从一个历史能给定的更高的起点出发;其次,回归原点、接续过去时,学术资源的断裂也为能否理解与继承前贤积累下来的学科发展的良好意识增加了不确定性。还

有,文革结束,当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恢复时,它已经落后于西方图书馆学,并且有了十多年的时差,这个差距也许要几代图书馆学者的努力拼搏才能赶上。

4 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三个繁荣期及其走低与再兴(1978—2008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发展时期,其中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恢复发展期,80年代中后期为鼎盛繁荣期,90年代为变革调整期,新世纪以来为振兴复升期。

1977年随着高考的恢复,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重新开始了图书馆学专业的招生,这标志着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新启动。1978年以后,国民经济的复苏、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事业也开始对专业人员有了大量的需求。国内诸多高校纷纷开办图书馆学专业,如1978年山西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分校、北京大学分校设立了图书馆学系,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南开大学分校成立了图书馆学系。从1980年到1990年十年间,国内图书馆学专业设置的数量从2个增加到52个,分布在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医科大学、工科院校以及农业院校。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有些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经过调整撤销,但国内图书馆学专业的整体规模还保持在20多个。

伴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层次也丰富起来。首先,在正规学历教育中出现了中等学历教育,如1983年长沙的湖南图书情报学校首开中等专科教育,其后北京海淀中学图书情报班、上海市图书馆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天津市图书馆中专班等诸多中等专科班相继开办,多时达20余所。其次,在高等教育领域图书馆学专业也建立起不同的培养层次。1981年11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同时获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1年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点,1993年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获得了图书馆学博士

学位授予权;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经过20多年的平稳发展,到2003年底,我国共有35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其中有25个本科专业、21个硕士授权单位、6个博士授权单位、2个博士后流动站,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与博士后流动站层次齐备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11]。此后数年,学科发展速度依然没有减缓。到2006年底,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点从25个增长到28个,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从21个增长到40个,博士学位授权单位从6个增长到9个,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的有5个机构^[12]。截至2008年底,据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的最新调查,中国大陆共有50所高等院校和机构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其中有29个本科专业、42个硕士授权单位、8个博士授权单位、5个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5000人左右。

图书馆学办学层次的丰富还表现为成人教育(又称继续教育)、各种培训教育事业的繁荣。成人教育主要有函授、电大、自学考试三种类型。函授教育起于20世纪50年代,1980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又重新恢复招生,有2至3年的大专和专本连读5年的本科两种学制。1980年至1985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函授教育发展高峰期,仅北京大学招收函授生就有2252人,武汉大学招收函授生有1282人。图书馆学电大教育也兴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面向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招收了2万余名图书馆学大专生,学制2年,有1.2万学员毕业^[10]。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还在多个省区连续数年面向社会举办了图书馆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遍及全国各地。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图书馆学教育,除了办学规模扩大、层次丰富以外,其良性发展的特点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初步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与教材系列。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了图书馆学基

础理论、基本技能与方法的教学与训练;同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增开情报学、管理科学、图书馆自动化、缩微与声像处理技术等方面的课程,在90年代后期又增加了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语言、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检索、传播学原理、文献计量学、情报分析与预测等课程。1992年,首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图书馆学基础、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目录学、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与主题法、文献编目、读者研究、社科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现代技术等12门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几乎都有新编教材问世,使得图书馆学专业核心知识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

(2)图书馆学逐步与其相关学科形成“团簇”(cluster),共同发展壮大。图书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属于小学科,经常处于边缘的地位。为了增加自身的社会公认度与生长度,图书馆学积极寻求与自己有同族关系的学科形成团簇,如与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学同组一个学科平台。1984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成立,以及后来部分大学图书馆学系分设的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学等专业,都表现出了较好的生机。图书馆、情报、档案、出版等工作,共同担负着知识信息的保存、传播和利用的使命,在文化传承与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这些学科的相同点将它们组合起来发展,不仅有利于图书馆学也有利于其相关学科的发展。1992年公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列为一级学科;1997年国家研究生专业目录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一级学科独立归属“管理学”门类,下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可以看出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图书馆学教育受中国社会现实的作用与学科赶超意识的影响表现出了两种趋向:一是在专业发展遭遇不景气时采取了突围之举;二是不断追踪国外专业发展水平尽快实现赶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社会工具理性蔓延,图书馆事业发展步履维艰,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出现了招生难的局面,图书馆学教育一度遭遇到了发展困境。为了摆脱危机,图书馆学教育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院系更名(或与其他院系合并)、拓宽教学目标、调整专业目录、更新教学方案、重置教学课程,这种突围式的改革基本“闯关”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些课程改革甚至伤及本学科的传统核心,导致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增长速度减缓甚至落后于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例如,原有的图书情报学院系改称信息管理院(系)后,图书馆学仅作为一个专业厕身其中。其课程体系为了与“信息管理”相吻合,许多课程名称加上了“信息”二字(或用“信息”取代课名中的“文献”),此外,专业课程内容驳杂,除了图书馆学原有内容,还包括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知识产权等多门学科知识,本科学生数年学习下来,竟很难说清自己的专业特色是什么。

而为了与国外本学科发展接轨,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任何一种新动向都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院系多更名为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我们国内图书馆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也多更名为“图书情报学系(院)”,并加大情报学课程或建立情报学专业。2003年美国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院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简称iSchool运动),它们将“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更名为“School of Information”或“College of Information”。新的信息学院致力于以信息、技术和人的关系为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注重与信息有关的跨学科整合发展。这一动向引起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高度关注。但“Library”一词正式离开了这些学院的名称,表现出去图书馆学的专业发展趋势,图书馆界感到iSchool运动与图书馆实践(职业)的关系更淡化了。在此情况下,我们是跟随其后,还是根据国情以及未来专业发展趋势做出与之不同的调整,这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5 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理性前瞻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理念的传播,尤其是各地图书馆事业发展态势的回升,国内图书馆学教育开始进入了一个理性振兴的发展阶段。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思路上也存在诸多混乱的认识。例如,前几年在本科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有学者呼吁图书馆学专业应停招本科生,把专业培养的重心转移到研究生;近两年有人认为图书馆精神、核心价值观的缺乏是导致图书馆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所以力倡建立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教学体系等。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药方”的副作用大于正作用。

看待专业的发展要有历史的视角、国情的把握与学理的洞察,缺乏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会使我们的判断产生失误。如把专业培养重心转移到研究生上,这似乎可以规避本科生源不足问题,集中教学资源致力高端培养,与欧美图书馆员准入制度接轨从而提升图书馆员的地位。但是,我国图书馆(尤其基层公共图书馆)待遇偏低、基层图书馆迫切需要专业人才、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较其他专业毕业生职业稳定性强、没有本科生会导致研究生生源萎缩等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取消本科教育。至于构建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弊端更大。因为,职业理念的培养来源于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两方面,我们不可能在专业教育一端解决这个问题;以职业理念来充任学科理论基础,有以职业规训替代学科原理、使学科理论基础浅薄化的危险;构建面向职业的本科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容易变相走向某种职业技术的老路上去。

随着我国公共文化事业以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基层图书馆高素质专业人员会逐步出现紧缺。鉴于此,一些地方高等院校开始增设信息管理专业(含图书馆学),这些举措有其合理性。从某种视角来看,图书馆学教育也属于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图书馆学教育有着自身的独立性,一方面它的发展与

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需求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图书馆事业量与质的提高,也必须依靠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所以,单纯根据事业发展需要而走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单位数量的专业发展道路会有所偏差。应该看到,影响未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建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①知识信息超载问题的严重性;②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速度;③信息技术与信息产品的普及状况;④我国图书馆学创新能力及发达国家图书馆学教育的调整方向;⑤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模与水平;⑥社会阅读风尚与终身学习行为的扩张程度。这些因素构成了图书馆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的内外部动因。

由于图书馆以及其它文献信息机构在未来知识社会“知识加油站”的作用会逐步凸显,因此,走内涵提升的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是我们的理性选择。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应该在专业教育方面做出以下积极调整:

其一,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以及分工自然整合与分化的态势,各种信息的生成、传播、利用的职场会经过重新洗牌而逐步出现明晰的职业界线,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逐步放弃面向信息的“宏大视野”,将专业注意力转移到“知识”上来。因为这是千百年来图书馆工作的场域以及未来可以继续发挥专业优势的所在。图书馆学包打不了“信息”的天下,图书馆学应该与自己的同族学科(情报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信息技术、管理学等)有所联系也有所区别,逐步发展属于自身优势的学科特长。如对文献等知识文本的形式与内容的研究,对图书馆等知识集合的组织方法的研究,对读者等知识受众的阅读与服务的研究。

其二,对以往丰富的办学层次重新进行定位。本科教育应该注重学生“通识+专业核心知识”的培养,硕士研究生教育应该注重专业研究能力的培养,博士研究生应该注重专业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在本科阶段,图书馆学专业可以按照6:4的比例来安排通识与专业课程,通识课程主要由文史哲、经典文献选读、外语、数学、计算机技术等组成,激发与培养学生人文、

科学、技术方面的好奇心、敏感力,使其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专业课程主要向学生传授图书馆学中核心的知识、方法(如图书馆学原理、知识描述、知识组织、知识检索与利用、数字图书馆、目录学、古籍整理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了解了图书馆职业所需的工作方法、技能,树立起初步的职业理念,同时也将有较强的反思能力、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对本专业的理论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其三,继承前贤“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思想,使专业教育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知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受新知识信息环境的影响,未来优秀的图书馆员的职业功能是“为不确定的知识与不确定的读者(或者反之)建立起确定关系”^[13],因此,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交流能力,还要有较高的知识组织、知识鉴赏、知识咨询的能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图书馆学教育除了教授学生知识组织课程外,还要着力培养学生具备有关知识文本与知识受众的知识,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要理解读物与读者这两个图书馆的要素。由于中文文献与中国读者都有自己的特点,基于网络的数字图书馆建设、读者在线阅读及移动终端的普及也不同于他国,因而在专业教育中如何根据本国的特点在新信息环境下来扩展、深化读物与读者两个元素的研究与教学,这就可能关乎我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

我们希望中国的图书馆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也曾大量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今后如何“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刘国钧语)^[14],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换言之,适合中国国情并能体现创新特点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还没有真正形成,仍需我们努力为之。

参考文献:

- [1]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208.

(下转第96页)

- [56] Yang J, Matsuo Y, Ishizuka M. An Augmented Tagging Scheme with Triple Tagging and Collective Filtering [C]. Proceedings of the IEEE/WIC/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Intelligence, 2007, 35-38.
- [57] Kim H L, Breslin J G, Yang S, et al. Social Semantic Cloud of Tag: Semantic Model for Social Tagging[J]. LNCS: Agent and Multi-Agent Systems: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Springer Berlin/Heidelberg, 2008(4953), 83-92.
- [58] Quintarelli E. Folksonomies: power to the people. ISKO Italy-UniMIB meeting[OL]. [2008-10-11]. http://www.iskoi.org/doc/folksonomies.htm.
- [59] Rosenfeld L. Folksonomies? How about Metadata Ecologies? [OL] [2008-10-11]. http://www.louis-rosenfeld.com/home/bloug_archive/000330.html.
- [60] Vanderlei T A, Durão F A, Martins A C, et al. A cooperative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 for search and retrieval software components[C]. Proceedings of the 2007 ACM symposium on applied computing. ACM Press. 2007, 866-871.
- [61] Quintarelli E, Resmini A, Rosati L. FaceTag: Integrating bottom-up and top-down classification in a social tagging system [C]. International IA Summit 2007. Las Vegas, US, 2007.
- [62] Farrell S, Lau T, Nusser S. Building communities with people-tags [J]. LNC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INTERACT 2007. Springer Berlin/Heidelberg, 2008(4663), 357-360.
- [63] John A, Seligmann D. Collaborative tagging and expertise in the enterprise [C]. In Workshop on Collaborative Web Tagging at WWW 2006. Edinburgh, Scotland, May 2006.

魏建良 浙江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讲师。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18号。邮编310018。

朱庆华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编210093。

(收稿日期:2009-04-01)

(上接第78页)

- [2]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科教处. 世界图书馆事业资料汇编[G].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290-309.
- [3] [德]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李秋零,田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4.
- [4] [美]罗伯特·M·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汪利兵,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0-34.
- [5] 吴鸿志. 武昌文华图书科之过去现在及其将来(续)[J]. 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1(2): 231-236.
- [6] 沈固朝,刘树民. 涓涓成川有师承:1913-1948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J]. 图书情报工作,2005(11):139-141.
- [7] 黄宗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六十年:兼评文华图专韦棣华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作用[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6):78-85.
- [8] Ding U Doo.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M]. Manila,1921:357.
- [9]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11-15.
- [10] 吴慰慈.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5):2-5.
- [11] 潘燕桃,程焕文.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5.
- [12] 肖希明,司莉,黄如花.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2008(1): 5-10,16.
- [13] 王子舟. 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2):16-23.
- [14] 刘国钧. 发刊词. 图书馆学季刊[J]. 1926,1(1):1.
- 王子舟**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北京。邮编100871。

(收稿日期:2009-04-28)